

忆往事之一

回望流年

——李新帆救亡与抗战



忆往事之一

回 望 流 年

——李新忆救亡与抗战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199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忆往事之一:回望流年——李新忆救亡与抗战/李新著. —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,1997. 12

ISBN 7-80136-120-2

I. 忆… II. 回… III. 革命回忆录-中国-1931~1945 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4236 号

回 望 流 年

——李新忆救亡与抗战

出版发行:中共党史出版社

通讯处: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:100091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

电话:(010)62881570 传真:(010)62881532

印 刷:北京地质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6.5 印张 160 千字

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2000 册

ISBN 7-80136-120-2/K · 106

定 价:12.00 元

前 言

近年来出版了很多回忆录。我看过的也不少，颇受教益。通过回忆录，使我对许多历史事实了解得更加具体和丰富。但是，大多数的回忆录都“隐恶扬善”，无论对别人或对自己，都是拣好的说，坏的不说或少说。其实这也难怪。人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，关于自己，多半爱说“过五关斩六将”的事，至于“走麦城”，连提也不愿意提。对别人，一般地是爱说别人的坏话，能为别人说好话的并不多。因此“隐恶扬善”只要说的是真话，就应该说是不错的了。至于那些对谁当权，就为谁说好话；谁倒霉，就说谁的坏话；甚至伪造历史，取宠求荣，这样的为拍马而写的“回忆录”，一切正直的人，都认为它不屑一顾，虽然也能凭权势而畅销一时，但用不了多久，就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。

写回忆录，按理我是没有资格的。记得50年代末，我在成都帮助吴老（玉章）写回忆录。在写留法勤工俭学时，恰好陈毅外长从国外回来，也住在成都金牛坝。既然住在一起，我就便过去访问了陈毅。他对留法勤工俭学记得很清楚，因此谈得很详细。他除谈了事实经过之外，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。他说：“赵世炎当时是党员，当我们在里昂被抓起来，关起来后，他却溜之大吉，一直跑到苏联去留学；而我们这批被捕的人，则被押送回国。他虽然是我党著名的烈士，我一直认为他当时这样的作法是不好的。领头的党员当逃兵，在群众中影响很坏。”陈毅由此更谈到我们的白区工作。他说：“我们的军队打仗，党员是冲锋在前的。但在白区游行示威，党

员却躲在后面，把非党积极分子推到前面去，因此被捕的多半不是党员。我们还认为这样很‘策略’。结果，非党同志为我们被捕，被杀头，使我们大大地脱离了群众。这样作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。你们看，‘血的星期日’不是布尔什维克领着群众一起去流血牺牲吗？”陈毅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。他谈完后，我说：“陈毅同志，请你再谈一次，我给你写成回忆录。”他说：“写回忆录，我没有资格。”我说：“你是元帅嘛，怎么没有资格？”他说：“留法的时候，吴老已经是名流了，我还是娃娃呢。”因此，以后我没有再找他谈回忆录的事了。陈毅尚且说他没有资格写回忆录，那么，我还有什么资格呢？

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，研究历史的人。我认为写历史应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写，把它写成信史、真史。但这样做是很难的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。自古以来，要想写真史，首先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。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”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。但是，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。即认为写史而不真，有违史德，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。尽管有不少“史学家”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，但悠久的光荣而伟大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完全失坠，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。

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，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“史学家”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，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，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。对于那些“隐恶扬善”的回忆录，虽然并没有隐去真事，但它毕竟太不全面，我也应该就我所知，加以补充，以便后人对真像不致以偏概全。总之，我写回忆录是应客观的要求，至于够不够资格，我就不管它了。

我写回忆录的目的既然是这样，那它就不能像文学作品《红楼梦》那样，把“真事隐去”，而要如实地把真人真事写出来。可是这样的回忆录是碍难发表的。所以我的回忆录都只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保存，并不想发表。

那么,现在为什么又出版这本回忆录呢?说来话长。大概是1995年吧?组织上考虑让我离休。既然要离休,就得确定我的工龄。从前,我的工龄都是从1938年,我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算起的。对此,我一直没有计较甚至没有注意。后来,我发觉抗战前参加工作与抗战后参加的待遇大不一样,而且,提拔干部也是一个大界限。因为解放初,邓小平就要我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,那就是副省长的待遇了。但吴老没有让我离开中国人民大学。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评定级别时,我就是行政九级(以后一直没有增长),也不算低。那时人们对级别的概念不像现在这样浓厚,现在是连和尚、道士都有级别。现在既然要离休,工龄就不能不计算。现在是,凡参加过一二九游行、跟着喊过口号的都算参加了革命,而我那时是重庆学联主席,能不算参加革命吗?何况我们被开除学籍以后,留下来没有被开除的人,现在都被承认是参加革命了。因此我请党委进行调查,解决我的工龄问题。党委根据我写的回忆录《风雨巴山》,派人去四川调查,结果证明我写的完全属实,毫无虚假。四川当年从事学运的老同志们看见这篇回忆录后,都劝我将它发表。我说:“其中的真人真事,不隐去能行吗?”他们说:“没有关系,顶多,对个别的人,你替他改一下姓名就行了。”为此,我才准备在党史出版社出版我的《风雨巴山》。出版社的同志对我说:“光出版《风雨巴山》未免太单薄了,要出,不妨多出一些。”既然出版社愿意多增加一些内容,我于是便把这次的回忆录增加为《救亡与抗战》,把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(1931—1945)这一段时期现成的几篇汇集到一起出版。这便是这本《救亡与抗战》出版的由来。

八年抗战,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期。无论是关于游击战争,减租减息、发动群众,统一战线,国共磨擦斗争以及整风运动等等,我都必须写,也准备写。例如我现在正写着的《中共北方局整风

记》就是非写不可的。但要发表就很难了,大概要等10年以后吧?这并非是我的顾虑太多。我已年届八十,并且早已有安身立命之所,不必为“稻粱谋”了,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?只是因为其中说到的人和事,距今太近,有的还活着,即使本人不在了,他的亲属还多嘛,何必要引起他们的不安呢?而且,有的领导人从政治上考虑;出版社从风险上考虑;都不愿出版这样的回忆录。因此,我一定要写的这些回忆录,暂时只能送存党史机关,束之高阁。但并不是要“藏之名山”,而是要等到适当时机才把它发表出来。最好是等死后才发表。“死后是非谁管得”,那时候什么评论都听不见了,多么干净!张学良要把他的回忆录留到下世纪(初)才发表,其用意很深,也可以说用心良苦。我认为他这样做很明智,所以我的某些回忆录也要留待将来发表。

以上,我把为什么要写回忆录,为什么要发表这本回忆录,以及发表的回忆录为什么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(不成样子),都如实地说明了。我写了这些,作为本书的《前言》,一则是请求读者谅解;二则是希望得到指正,以便今后能写得好一些。

李 新

1997年4月

目 录

一、九一八之忆	1
二、一二八之忆	16
三、风雨巴山	36
四、1942 年 5 月反扫荡的回忆	119
五、难忘的 1945 年	144
附：廿载重逢	169
我的好友王方名	172
雨歇凭栏	
——怀念李成之	193
“是为艺术光”	
——怀念周极明烈士	198
难忘太行山顶的夏月夜	
——怀念朝鲜烈士陈光华同志	202

一、九一八之忆

(一)

像我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这一代人,大多对九一八事变有着深刻的印象。也可以说,正是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我们高昂的救国热情,把我们推到抗日的前线。

1931年春,我考入本镇(四川荣昌县安福镇)私立棠香初级中学。这个学校既有春季始业的,也有秋季始业的。我因为小学是春季始业,所以上中学也是春季始业。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,我正上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。记得9月19日阅报栏前的学生,一看到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,热血就沸腾起来了。“打倒日本!”人们不住地高呼口号。有的同学立即奔向寝室,把用品中的一切日本货都拿了出来,直往操场奔去,并一路呼喊:要打倒日本,首先就要抵制日货,快把日本货拿到操场上去烧了啊!于是,人们都回去拿了日本货走到操场。

这时,上课铃声响了,但没有一个人往教室去。有人问:“今天还上课吗?”马上就有人回答:“国都快亡了,还上什么课?”接着,一个人在后面说:“先把日本货烧了,回头再上《最后一课》吧。”这位大概是高年级生,读过《最后一课》,他的话音里充满了悲愤。

很快,全校学生都集中到了操场上,没有人指挥,但秩序非常好。三年级各班在操场的最前面;其次是二年级;最后是一年级。尤

其是我们第八班，不但班次低，而且年龄小，个儿也长得不高，所以排在最后，成了全校的尾巴。每班学生围成一个圈，把日货扔在当中，等候一声令下，就放火焚烧。不一会，三年级的蒋大个儿站在一条凳子上喊道：“都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准备好了！”全场的回答有如一声巨吼。蒋大个儿又问道：“日本货都搜光了吗？”“光了！”在回答声中二年级三班的一个积极分子忽然高喊道：“我身上这件人造丝背心还忘了脱下呢”。蒋大个儿似乎没有听见他的喊声，就大声下命令：“烧！”于是各班班长和积极分子都点火焚烧，一时火光冲天，烟尘飞舞，极为壮观。二年级那位积极分子一面点火，一面忙脱下自己身上的背心往火里扔，他不顾光着脊梁在那里烧火，周围的人都为他鼓掌欢笑。

随后在校学生会的主持下，召开各班班长和积极分子的会议，讨论如何到镇上去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。会上决定成立宣传队和查货队。安富镇是一个著名的大镇，镇上商家很多，卖日货的商家不少。查出了日货怎么办呢？有人说把他烧了；有人说没收，作为以后运动的经费。大家都拿不出一个准主意。于是立刻去把教国文的邱老师请来求教。邱老师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，在五卅运动中又是积极分子。但他认为抵货运动不可冒失，要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。到商店去查货可以，对日货应进行登记，要他限期卖完，并且以后不许再进日货。这样，由于日货迫卖，一般货价就会下跌，群众对抵货运动都会满意。对商人来说，不没收他的日货，他就满意了，而且还允许他卖出，只是不允许他再进，他也会觉得为了爱国，商人应该这样办。邱老师说：抵货运动初期，重点在商家，即不许商家买卖日货，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很大的胜利。至于不用日货，只作一般的宣传。不要去干涉使用日货的一般群众。等运动深入，我们再号召群众不用日货，提倡用国货，说用国货就是爱国，用日货就等于帮助了日本。邱老师还说：中国政府是软骨头，恐怕抵制日货，会

受到禁止，你们应该早做准备，把抵制日货叫做抵制仇货，而且尽量宣传使用国货，这样会使阻力小些，能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。大家都认为邱老师的意见很好。当即把宣传队和查货队的人员决定下来，并推选出两个队的队长，准备第二天就到镇上行动。

第二天，我们就到镇上展开抵制仇货运动。老百姓都说：日本就是我们的仇人嘛，日本货就是仇货，该抵制。邱老师的意见很受群众欢迎。而且不几天，上面就有命令下来，说不应该抵制日货，这证明了邱老师果然有先见之明。我们按邱老师的指教办事不会错。当我们走进商家去查货的时候，开始他们有些紧张，等我们登记完了仇货，并说允许他们定期出售，只不准他们再进仇货时，他们都很高兴，不住地说：各位先生把自己用的仇货都烧了，却不烧我们的，你们真好啊！有了你们这样的爱国青年，中国亡不了！在镇上只进行两天，仇货就查完了，宣传工作也取得很好的成绩。而且在商会自订的限期内，各商家都把仇货卖完了，同时据商会报告和我们的调查，各商家都没有再进仇货。

（二）

日本军队侵占沈阳后，迅速占领南满，很快长春也失守了。日军又向北满进攻，除在嫩江桥遭到马占山的抵抗外，哈尔滨、齐齐哈尔等地都落入敌人之手。不过几十天功夫，美丽富饶的东北——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，全部沦为日寇的殖民地，我亲爱的3000万东北同胞，都成了日寇铁蹄下任人蹂躏的奴隶。

东北的沦陷对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对爱国青年学生是莫大的刺激，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，异常愤慨。张学良身为东北军政长官，守土有责，因此更遭到全国人民的责骂，骂他是“不抵抗将军”。就在这时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刊登出马君武的两首诗《哀沈

阳》，一时全国传诵，更让张学良名誉扫地。

《哀沈阳》诗云：

(1)赵四风流朱五狂，

翩翩蝴蝶正当行。

温柔乡是英雄冢，

哪管东师入沈阳！

(2)告急军书夜半来，

开场弦管又相催。

沈阳已陷休回顾，

更抱佳人舞几回。

诗中所说的赵四，就是著名的赵四小姐，当时张学良正对她迷恋得不可开交。诗中所谓的朱五，是朱启铃的女儿。我们当时在北平上学的学长们，回来都曾对我们说过：“北京有个灯市口，朱家小姐卖风流。”至于蝴蝶，那是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，她这次从上海到北平，是为了自己的业务，说她在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跳舞，是传闻之误。马君武把它写入诗中，当然是错了。但后来有人说他借此骂张学良，完全是为了替蒋介石开脱罪责，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。因为马君武对蒋介石的统治从来未称颂过，他写《哀沈阳》还是出于爱国义愤。他这两首诗能在全中国传诵一时也绝不是偶然的。

九一八之夜，张学良并没有和蝴蝶翩翩起舞，但他带着赵四去看梅兰芳演戏则是事实。九一八之前，日本挑动朝鲜反华，并在东北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，谁都能看出日本将有大的侵略行动。对此，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是明白的。但蒋介石早已下定不抵抗的决心，并一再指示张学良，而张也是完全遵照执行的。因此，骂张学良是“不抵抗将军”并不错，只是把不抵抗的全部罪责都放在张学良头上，而不追究祸首蒋介石，那就不对了。

我们当时棠香中学的学生，对蒋介石和张学良本来就没有好

感,到九一八,对他们更加痛恨。当时四川荣昌县属于军阀刘文辉的防区。在1930年“中原大战”(蒋介石与冯玉祥、阎锡山之间的军阀混战)时,刘文辉估计蒋介石会失败,所以他派人参加了汪精卫在北平召开的“扩大会议”,但结果是张学良引军入关,帮助蒋介石获得全胜,参加“扩大会议”的各派(包括汪精卫和冯、闫在内)全都失败了。刘文辉这时赶快转弯,派人向蒋介石疏通,表示他以后一定拥蒋。蒋因鞭长莫及,也就罢了。1930年,安富镇满街都是打倒蒋介石,拥护汪精卫和拥护冯、闫的标语。随后,这些标语被抹掉了,但是较偏僻的地方,痕迹依然可见。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,对张学良入关助蒋就很不满意,见他入据北平后,生活又极其腐败,而且吸毒瘾深,意志消沉,对他就更加唾弃。及至九一八,他又成了“不抵抗将军”,我们读到马君武的诗,发泄了心头的积恨,所以对那两首《哀沈阳》十分欣赏。直到今天,虽然事隔60多年了,我还能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当然,张学良以后转变了,特别是他发动西安事变,促成国共合作以至推动了抗日战争。他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但九一八这一段历史,我相信今日年近期颐的张将军,回首当年,也一定会感到莫大的遗憾。

(三)

我们荣昌县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爱国运动中,以安富镇表现最好、最有成绩。在我们荣昌县,县城在县的东半部,而安富镇在县的西半部,这样便形成两个中心,正像重庆和成都形成四川东西两个中心一样。荣昌县东部以县城为中心形成的势力称“城帮”,西部以安富镇为中心的势力称“烧帮”(因为安富镇又名烧酒坊)。在九一八运动中,荣昌城因为和重庆关系较为密切,当时重庆是军阀刘湘的重镇,而刘湘是一直紧跟蒋介石的,对抗日爱国运动不支持,

荣昌城受其影响，爱国运动不热烈。城内各学校（如县立中学，简易师范和蚕桑学校等）的学生，对此很不满意，纷纷写信和派人来和我们联络，希望我们安富镇的学生到城里去游行，帮助和推动城里的爱国运动。

我们棠香中学的学生，对于城内各校同学的要求，当然满口答应。为了到城内去游行的队伍声势浩大，必须把安富镇各校的学生都联合起来。当时安富镇除棠香中学外，主要的学校就是私立开智女中（初中）和私立大观小学、私立明远小学（都是完全小学）。由于我是校学生会委员和第八班班长，而且对几个学校都比较熟悉，所以学生会就委托我负联络之责。开智女中校长罗承烈兼任我们的博物教师，我对他很尊敬，他对我的印象也很好（主要是我的学习成绩不错）。因此我大胆地去找他直接商量，希望他能让开智女中全体同学参加到城里去游行。罗承烈校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并立即把校学生会主席叫来，要我和她去给学生会商谈。这位学生会主席和我并不熟悉，但也认识。等到和全体学生会委员们见面时，其中不但有我的小同乡，而且有我高小的老同学，因此大家谈得很欢洽。她们不但答应全体都去参加游行，并且还应我的要求，推举一个人出来担任游行队伍的副总指挥（至于总指挥应以男生为宜，棠香中学当然义不容辞了）。开智女中联合成功后，我便去大观小学。我曾在大观小学读过高小一年级，因为成绩好，校长很喜欢，我二年级的时候因家庭经济困难转学走了，校长还感到很遗憾，一直打听我的情况。为此，我便直接去找校长。校长见我很高兴，商谈的结果是高小学生参加，初小学生只在镇内游行，就不到城里去了（因为安富镇离城有 40 里，来回 80 里路，初小儿童是走不了这么远的路程的）。对于明远小学，我们第八班有一位比我更熟悉，他不但是明远小学毕业，而且家就住在明远旁边，他父亲与明远的校长又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因此我便让他去交涉。结果很成

功，和大观小学一样。

为了到城里去游行，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。我们去请教邱老师。邱老师说：九一八后，全国的爱国运动非常高涨，很可能要闹出大事来。现在，全国都叫抗日救国，我看叫救国很好，更能激发群众。这是一场大的政治斗争，抵货运动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了。你们到城里不要搞抵货了，就是城里有人搞，你们也别去参加，尤其是查货，千万不能去，安富镇的学生到城里去查货，是会遭到人嫉恨的。听说你们荣昌县有“城帮”和“烧帮”之分，这很不好。你们这次游行，可不要被人利用了。要争取通过这次运动把全县的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起来。我们希望邱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城，邱老师说：不行！你们荣昌县情况这么复杂，我更不能去。

邱老师不愿参加我们的游行。但是，奇怪得很，学校当局，校长龙树芳、训育主任罗溪午、庶务主任李乐斋以至体育主任、童子军教练都要参加我们的游行。而且专门派了一个校刊的编辑来“指导”我们的宣传工作。这次安富镇学生的游行，组织是统一的，总指挥是我们棠香中学的蒋大个子，副总指挥有3个：一个是开智女中学生会的人，另外两个则是大观小学和明远小学的教师。这次活动没有查货队，但组织了宣传队、纠察队和救护队。宣传队由各校出人，编成3个分队；纠察队由4所学校各出一个童子军小队组成；救护队则完全由开智女中负责。所有这些组织，统归总指挥部委员会领导。而总指挥部的委员是由各校学生会推选出来的。由于宣传工作重要，总指挥指定棠香中学和开智女中的学生会主席负责。我也在其中担负了一些工作，主要是宣传口号方面的事情。我们的口号都是请教过邱老师才决定下来的，提得很慎重，没有几条，并且连锁着喊口号的人也事先指定，不许旁人随便喊口号。我们对校刊编辑来“指导”宣传工作婉言谢绝了。我们说：这次活动是各校的联合行动，由棠香中学来“指导”恐怕说不出口，而且这是学生的行

动,学校当局何必管这么多呢?学校当局最好把老师们发动组织起来,让老师和学生比赛抗日救国的积极性。那位编辑很不高兴,快快地走了,但还是把他带来的一张口号单留下来给了我们。我们立即拿着口号单去找邱老师。邱教师看后,笑了一笑,说:不要把他们提出的口号全都废了,可以印出供参考。不过像“谁反对学生爱国运动就打倒谁”,这样带挑拨性的口号应该取消;“拥护××县长领导学生爱国运动”,这条近乎拍马屁,可以改为“拥护××县长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”。我们听了这席话,大家都笑了,并且说:“我们学生的运动,怎么能请县长领导呢?真是天大的笑话。”临走时,邱老师一再叮嘱:不要被别人利用啊!

大概是11月底(记不清是哪一天了),安富镇各校学生,黎明即起,开始游行。除初小的儿童到镇东的关门栅子停止前进外,其余高小以上的学生,一面呼口号,一边唱歌,浩浩荡荡直奔荣昌县城。沿途还有附近的学生,因事先就有联系,按时参加进来。这样队伍越来越大,声势越来越壮。等快到城墙的清江河边,狮子桥畔,学生队伍已超过3000人。城里欢迎和参观的人很多,人山人海,挤得水泄不通。很快,城内学生的游行队伍,也按计划前来汇合了。一时,欢呼声和口号声惊天动地,高入云霄。这次游行,只顾宣传,并不查货,队伍行进得很快。原定在城内各大街游遍后,即到城郊蚕桑学校开大会,成立全县的学生抗日救国会。但队伍走到文庙附近的教育局门口时,我校那位校刊编辑忽然拿出口号单来,让一小撮人跟他高呼:“反对教育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!”这时教育局的人出来干涉,他却喊:“教育局打人啊!我们往里冲!”由于听说教育局打人,人们非常激愤,队伍中的一些人不明真象,便跟着进了教育局。教育局长被吓跑了,文件被乱翻、撕毁乃至焚烧,整个教育局被捣毁得一踏胡涂。总指挥蒋大个子控制不了队伍,看到刚赶到的我,忙问该怎么办?我一看是上当了,被人利用了,应该改变游行计划。

恰在这时城内各校的指挥也赶到了，于是立刻商量，决定把游行队伍的前队改为后队，由后队领头把队伍开到县中去集合并吃午饭，然后再商量午后如何行动。这位指挥是县中学生会的负责人，他知道这次游行队伍是安富镇的学生在前面，而以棠香中学为前锋；县城各校学生在后面，又以县中学生殿后。他于是立即派人赶到队伍的最后头，让县中学生掉过头来，领着全部队伍回到他们学校去。

城内和安富镇两个指挥部的人员都集中到县中学生会的会议室里，认真研究这次游行发生的问题。安富镇的人说：棠香中学那位校刊编辑扬言，他从文件中查到了各学校向教育局报告的积极分子名单。可见教育局不但不支持爱国运动，并且还准备迫害学生。城内的人说：教育局不支持爱国运动甚至可能迫害学生是真的，这次把教育局冲了是好事，太叫人高兴了。大家对此进行了分析，认为荣昌县是刘文辉的防区，他现在仍是省主席，县长是他任命的，因此并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；而教育局长与重庆刘湘通气，所以对学生态度不好。看来，棠香中学学校当局是想利用县长来打击教育局长，扩大“烧帮”的势力。大家一致认为：我们学生不应卷入“烧帮”、“城帮”这类封建宗派斗争，我们应把全县的学生团结起来，成立全县的学生抗日救国会。但对于全县学生的联合，无论“烧帮”、“城帮”以至政府当局都是反对的。这次到城内游行，安富镇和城内各校学生会都曾设法与各乡镇学校联络，但真正来参加的还不到全县各学校的一半。这都是“烧帮”和“城帮”的学校当局破坏的结果。因此我们原想到蚕桑学校去宣告成立全县学生组织是不行的，那样他们会说我们是假冒。商量的结果是：城里各校去联络东半县各校都派代表到安富镇去，安富镇各校则联络西半县各校，然后全县代表一齐在安富镇开会，如果到会代表超过全县学校过半数，我们就宣告成立全县学生抗日救国会；如果不到半数，我们就先成立筹备会。